

声音

# 七年匆匆 只争朝夕

■刘颖余

“七年之后，我25岁，希望(冬奥会)有我的身影。”18岁的中国女子冰壶队员姜馨迪，在得知北京冬奥组委正式成立的消息后，难掩内心的激动。

像姜馨迪一样，每一个中国人都对2022充满美好的期许。这些期许不尽相同，但却可以化为一个共同的目标：继2008年举办一届无与伦比的夏季奥运会后，北京将联手张家口为世人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精彩、非凡、卓越”，如此沉甸甸的六个字岂能唾手可得？它需要东道主付出更多的心血和更为艰苦卓绝的努力。

北京冬奥组委成立，标志着我们的工作已经由成功申办转入7年筹办。在未来不到7年的时间，我们需要兑现申办时所有的承诺，将那些美好的愿景全部付诸现实。这是一个看似漫长的约定，但留给东道主的时间其实并不充裕。对于2022年冬奥会的筹办者来说，必须有一种只争朝夕的干劲和热情，还需要国际化的视野、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

■本报记者 郎成

“在2015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举行了200多场搏击类比赛，但这些比赛大多数都是单场比赛，连续性不够，很多比赛的作秀成分比较重……”

本周三，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邵世伟在某自由搏击赛事发布会上不无担忧地如此表示。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中国武术散打职业联赛、中国最早的职业综合格斗赛事“英雄榜”也都在京城召开了开赛新闻发布会。

自由搏击、综合格斗、泰拳、散打……各式各样的赛事纷至沓来，火热的场景似乎要为搏击迷们驱走冬日的严寒。然而，前面真的是中国搏击产业的春天吗？

本土市场起步坎坷

众所周知，自由搏击、综合格斗、泰拳，甚至包括职业拳击在内的搏击类赛事都是舶来品。据了解，中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便开展现代搏击运动，只不过当时及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以散打的形式出现。

2015年，国内搏击类比赛迎来井喷，各式各样的赛事让人应接不暇，这到底是百家争鸣？还是鱼目混珠？

## 擂台之上有“乾坤”

林武僧”的‘卖点’，这就是赛事需要的。”

中国散打寻求突围

如今国内不少品牌赛事，为了吸引观众，将自由搏击、综合格斗、泰拳、散打等各类搏击项目都包含在内，周金彪认为，虽然这对繁荣市场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却像“大杂烩”一般，“什么都有，看起来热闹，对整个市场走向的培养非常不利。”

不过周金彪也坦言，仅靠散打一个项目，在吸引力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外来搏击项目对散打的冲击确实很大，散打的限制性条件比较多，目前也只能自己人和自己人打。”

面对愈发火爆的自由搏击、综合格斗以及泰拳对决，从当年的“散打王”，到“功夫王”，再到“中国真功夫”，中国散打不但陷入了舶来赛事的重围，也始终难以突破自身的瓶颈。

即将于明年年初开战的中国武术散打职业联赛，被看作是中国散打的“突围”之举，而对于那些“体制内”选手来说，也是一个利好消息。

“体制内选手有个很奇特的现象——不愿意出名，因为出名之后就没有机会去打体制外的比赛。而中国武术散打职业联赛通过采用和武管中心合作的模式，邀请体制内选手参与到商业比赛中来，一方面提高选手收入，另一方面也希望体制内选手能够走出去，在未来顺利适应转型。”负责运作这项赛事的北京中武利百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周硕对《工人日报》记者表示，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体制内选手可以在体制内外“并行”，“不是因为职业化，体制就不存在了。体制还在，只是我们在转型”。



“中外大战”是国内各类搏击赛事惯用的噱头。本报记者 郎成 摄

的确，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操办的体育大赛越来越多，办赛经验日益丰富，也拥有一支初具规模的专业办赛队伍。国际体育组织大多认为将赛事交给中国举办，“是让人放心的决定”。但冬奥会对于中国来说，是全新的大型赛事。冬季项目，是为数不多的人和自然打交道的体育项目，赛事组织的复杂性和专业性，非普通体育项目所能相比。而且，受地域、气候影响，我国冰雪运动水平有限，一直属于小众运动。目前，我国只开展了冬奥会7类15个大项102个小项中的七成项目。2014年索契冬奥会，我国只参加了不到50个小项的比赛，且冰上项目居多，占全部项目2/3的雪上项目开展得少之又少。在中国举办冬奥会，无论是办赛经验、自然条件还是群众基础，都没有太大的优势。这也是中国奥委会从申办时就力推“三人上冰雪”规划的主要原因。

还应该看到的是，自2018年起，连续3届奥运盛会都将在东亚地区举办，这是奥运

史上从未有过的格局。传统亚洲体育三强势必通过奥运盛会，展示自己独有的体育文化，并在国际体育文化交流中谋求奥运综合效应，以实现全人类奥林匹克文化的共享。这是另一场看不见的“竞技”。如何借2022年冬奥会筹办之机做好我国冬季运动发展宏观布局，谋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给世人留下新的丰厚的奥林匹克遗产，既是充满挑战的课题，更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使命。

尽管面临的挑战空前巨大，但中国举办冬奥会的优势也显而易见：强大的举国体制、高效率的社会动员体制、群众对于赛事的支持和参与热情、北京奥运会和南京青奥会留下的宝贵遗产，都会让我们的筹办受益。尤为重要的是，北京冬奥会找到了正确的战略路线图，无论是过去的申办理念（以运动员为中心、可持续发展、节俭办赛），还是现在的筹办原则（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2022年冬奥会和国际奥委会的《奥林匹克2020议程》均一脉相承，注定是一届将要载入史册的奥运盛会。

诚如北京市市长王安顺所言，“2008年奥运会，推动了中国夏季体育运动的普及，如果成功申办冬奥会，也将加快中国冬季运动的推广，提升人民的健康水平，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成长和生活方式。”2022年冬奥会不仅对于人类奥林匹克运动将贡献良多，而且还会激励和改变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三亿人上冰雪，京津冀一体化，“APEC蓝”常态化，体育产业爆发性增长……这是看得见的改变；淡化金牌、体育生活化、体育向社会输出价值观，体育教育成为共识，体育软实力增长……这是看不见的改变。无论看得见还是看不见，改变已经发生，改变必将发生。

从2001到2008，从2015到2022，同样的七年之约，同样的艰苦卓绝，同样的充满希望，但却非简单的轮回。因为，这一次，我们拥有了更宽广的视野、更从容的心态，更务实的考量。我们可以做到更好，我们也应该做得更好！



## 恒大“过招”巴萨三球落败

12月17日，广州恒大队球员黄博文（中）的犯规被主裁判判罚点球。

当日，在日本横滨国立竞技场进行的2015年国际足联世界俱乐部杯半决赛中，广州恒大淘宝队以0比3不敌巴塞罗那队。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备受瞩目的中国足球改革如何才能取得预期成效，试点和实践至关重要——

## 足改破坚冰 试点出“真知”

■本报记者 李元浩

“春城下雪了！”伴随着自2012年以来昆明城区的第一场明显降雪，第十届中国足球协会第二次会员大会（简称“全国足代会”）于12月16日至18日在海埂体育训练基地举行。俗话说：“瑞雪兆丰年”，在罕见寒流中揭幕的此次足代会，肩负着进一步推动中国足协和中国足球深化改革的重任，也担负着社会各界对中国足球打破坚冰，寻求突破的愿望与期许。

—试点城市为改革“探路”

“如果没有赶上足球改革与发展试点的春风，像内蒙古这样一个足球基础几乎是空白的地区，怎么可能有机会与德国足协展开合作”，在足代会现场谈起上个月与德国足协共同打造内蒙古青训和竞赛体系的合作，内蒙古足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谭景峰依然倍感兴奋。自2014年9月被列为中国首个足球改革试点省区以后，内蒙古在近1年多时间里实现了从无规划、无联赛、无人才、无职业队和无经费保障的“零基础”，到如今基本建立起从规划、专业梯队、竞赛体系到社会氛围的全方位足球发展体系，“足球改革试点功不可没”。

如同任何一项改革都需要不断实践和摸索，志在改变中国足球长期落后局面，推动足球事业全方位发展的中国足球改革，更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随着《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出台，在不断推进足改措施贯彻落实的过程中，改革试点的重要日益凸显。

在中国足球的改革进程中，试点由来已久。早在1992年6月著名的“红山口会议”中，中国足协就决定把1994年甲A联赛作为足球职业化改革试点，逐步把中国足球推向市场经济轨道。经过10年甲A和10年中超联赛的摸索与实践，中国足球顶级联赛基本完成了由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

新一轮足球改革大潮中，成都、青岛、

武汉、广州和大连从2012年底开始成为中国首批发展试点城市，在发展观念、协会建设、竞赛体系建设、培训体系建设、评价体系建设、政策体系等6大领域制定和完善足球改革发展内容，并与中国足协约定发展目标。随着中国足球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内蒙古又以整个自治区的广阔范围成为中国足球改革试点省区，承担起为中国足球深化改革“探路”的重任。

“内蒙古被确定为足球改革试点省区，既

是挑战更是机遇”，中国足协足球改革专家组成员、呼和浩特市足协秘书长刘洁对《工人日报》记者表示：“我们要认识到足球改革试点的责任和职责是什么，依据自治区制定的足球改革发展规划去落实具体工作，为足球深化改革摸索经验。”

足球改革需齐头并进  
此次足代会上，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张



视觉中国 供图

当智能化体育场馆兴起之际，处在变革期的体制内体育场馆需要焕发更多的活力——

## 公共体育场馆的转型之路

■本报记者 袁浩

本周三，乐视体育与五棵松体育馆达成合作协议，双方将对场馆进行智能化改造，并引入互联网的方式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提升场馆的商业价值。无独有偶，今年6月，虎扑体育也对外公布将在全国40多个城市打造智慧城市运动场。

当这些“外来物种”纷纷进入体育场馆，赋予体育场馆互联网和智慧化的色彩时，体制内的一批公共体育场馆也面临着变与不变的转型抉择。

政策扶持有利有弊

当前，我国的体育场馆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体制内的体育场馆归国家所有，分由不同级别和系统的单位进行管理，如工人体育场归北京市总工会所有，而地坛体育中心归东城区体育局所有。体制外的体育场馆大多归企业或私人所有。

内外有别，不仅体现在所有权上面，北京市东城区体育局副局长马力告诉《工人日报》

记者，这种差别还体现在真金白银上。“体制内的体育场馆享有国家的财政补贴，因为这些场馆承担着服务全民健身事业，每年必须免费低收费开放多少时间，而体制外的场馆不可能享受这样的待遇。”

财政差额补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场馆的经营和维护问题，能够让老百姓享受到较低的成本参与体育锻炼，但也让其矛盾丛生。

当前，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只有1.46平方米，远远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拉长场馆每天的开放时间，周末和节假日都开放。在正式员工通过轮班的方式仍然不能满足这样的开放强度之后，就产生了加班费。

按照规定，根据每个人担负职责的大小，每个人拿到的工资在拨款金额上浮动，但一个单位的总额是一定的。“超出了8小时的工作时间就算加班，但是加班费谁来给？按照规定是多劳多得，但现实情况不允许，由此，也产生了员工工作积极性不高、公共体育场馆开放力度不够和服务质量有待提升等问题。”马力说。

场馆智能化力不从心

在社会资本不断涌入，一些私有或混合所有制的体育场馆纷纷向智能化场馆转型的时代，体制内的公共体育场馆能因时而动吗？

马力给出了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向属地的科学技术委员会申请科研立项，科研经费不超过50%，但前提是这个项目必须是首创的。另一种方法是向所在地的发改委申请立项，如果这套智能化设备能让场馆节能减排、更加环保，通过评估后，它们最多会承担项目所需经费的30%。

两种方案都有一定的门槛，因而，想将现有的场馆改造为智能化场馆难度不小，要想搭上当下的“互联网+”的快车，同样并非易事。

对于中小规模的场馆，国家通过估算其服务人数进行补贴。估算确定补贴金额在准确度方面有困难，但这一政策不完善的方面，在马力看来，也是一个创新的突破口。互联网企业可以帮助场馆开发一套管理运营系统，通过APP来定场地，既能将

线付款、积分、评价、分享等附加在体育场馆上，又能为上级政府提供补贴依据。“何乐而不为？”

但马力坦言，互联网企业在与体育场馆合作的过程中，资金、风险承担和设备维护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毕竟公共体育场馆是国有资产，承担着一些公益责任”。

制度的掣肘也再一次提醒，公共体育场馆所有权和运营权分离势在必行。今年7月，北京市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推出了加快国有体育场馆所有权和运营权分离改革。未来，将由第三方来经营公共体育场馆，政府通过评估、购买服务。

大健康中心是方向

“现在的体育场馆还停留在收场租的时代，就像在停车场收停车费一样，但这样做，经济效益是很少且可以穷尽的，一个体育场的收益就是，每天开放多少小时，乘以每个小时多少钱，再乘以一年开放的天数。”马力把这个类似“大物业”的方式来经营体育场馆的阶段称为“1.0时代”。然而，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体育锻炼，对体育健身有更高要求的时代，公共体育场馆应该具备更多的功能，如组建体质监测室、身体机能测试室、运动心理室和理疗恢复室。通过对个人数据的长期追踪，就能为居民参与锻炼和开具运动处方提供依据和指导。这就是马力眼中的“体育场馆的2.0时代”。目前，朝阳门内的一家私人健身中心，已经建立起了这样的模式。

在马力看来，体育场馆倘能如此运营，就具有了更多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这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